多模态与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研究

霍晶

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多模态理论与生态话语分析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向。本文梳理了模态的定义、分类及单模态与多模态的区别，阐述了以视觉语法为核心的多模态理论框架，包括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生态话语分析的多种模式：豪根模式强调语言的多重功能及其社会文化作用；韩礼德模式揭示语言系统本身的生态破坏性；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分别从解构与建构立场展开分析；和谐话语分析根植中国语境，提出良知、亲近和制约三原则。本文认为，多模态理论与生态话语分析的结合，有助于揭示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多模态；生态话语分析；视觉语法；和谐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言学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ultimod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uo 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China Heilongjiang Harbin 150040

Abstract: Multimodal theory and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re important direction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odalit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nomodality and multimodality, and the multimod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visual grammar, including representational, interactive and compositional meaning. It then explores several model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Haugenian model stresses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language; the Hallidayan model reveals the ecological destructiveness of the language system; critical and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nalyze discourse from deconstructive and constructive standpoints; and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roote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proposes the principles of conscience, proximity and restrai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tegrating multimodal theory with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elps reveal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ecology.

Keywords: Multimodality; Ecological discourse analysis; Visual grammar;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0 引言

20 世纪以来，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符号共同参与意义建构。与此同时，生态危机促使学界反思语言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作用，生态话语分析由此兴起。多模态理论与生态话语分析虽分属不同领域，但都关注符号、社会实践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具有内在互补性。本文梳理模态的定义与分类、多模态理论的核心框架以及生态话语分析的主要模式，并探讨二者结合的理论价值。

1 模态

1.1 模态的定义

模态到底是什么？Forceville 给出的回答是：它是一种符号系统，专门用来对特定的感知过程进行意义建构。按照他的划分，模态共有九类，分别是图像、书面、口头、手势、声音、音乐、气味、味道和触觉（冯亚冰，2017）。这个分类听起来有些琐碎，但背后有一个朴素的生理学前提——人接收外界信息，归根到底靠的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这五种感官。模态要被人感知和解读，就必须经由这五条通道。朱永生（2007）正是据此把模态分为视觉模态、听觉模态、嗅觉模态、味觉模态和触觉模态，强调感官在信息处理中处于核心位置。

胡壮麟（2007）指出，“模态是可对比和对立的符号系统，媒体是符号分布印迹的物质手段”。这一观点提示我们，模态不仅是单独存在的符号系统，也常与其他模态相互作用，形成丰富的符号网络。李战子（2003）进一步扩展了模态的概念，指出多模态不仅包括文本，还涵盖图像、图表等各种复合话语，任何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都可以视为多模态的表现。这一界定突破了传统语言中心主义的局限，将图像、声音、色彩等非语言符号纳入意义分析的视野，为后续多模态话语分析奠定了概念基础。

1.2 单模态与多模态

单模态和多模态的差别，Forceville 讲得很清楚。所谓单模态，就是交流时只动用一种表达方式，要么是语言，

要么是图像。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表现力和深度都容易受限。多模态就不一样了，它至少动用两种模态，语言、视觉图像、听觉效果可以一起上，意义的传递也就更复杂、更丰富。Forceville 还把多模态分成广义和狭义两层：广义上，只要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结合，就算多模态；狭义上，他更看重的其实是模态之间的互动，也就是不同模态共同呈现，把源域和目标域的关系描绘出来（冯亚冰，2017）。

顾曰国的看法跟 Forceville 很接近。在他看来，多模态讲的是人跟外部环境互动时动用了多少种感官。只用一个感官，是单模态；用两个，是双模态；用到三个甚至更多，才算多模态（顾曰国，2007）。这个分法虽然简单，但很实用，能帮我们理解人是怎么在复杂交流环境里，靠多种感官配合来强化沟通效果的。后来 Kress 和 van Leeuwen（1996）又把多模态的边界往外推了一步。他们提出，人类的交流从来就不只靠语言。视觉、音响、文字这些模态一旦结合起来，信息传递的效果会明显不同。

1.3 多模态理论

模态话语分析真正兴起，是 20 世纪以后的事。科技进步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让图像、声音、文字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里变成常态，学界不得不开始正视这个现象。R. Barthes 算是最早吃螃蟹的人之一，他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至今仍被用来解释图像和文字之间的关系。这门学问的底子，其实来自两处：一是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二是符号学。Kress 和 Van Leeuwen 后来把语法分析和多模态话语接在一起，提出了视觉语法。国内起步晚一些，李战子等人先做了引介和探索，张德禄则依托系统功能语法搭起了一个分析框架，把文化、语境、意义这些层面都纳了进去。

视觉语法把多模态语篇分成三个层面：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这三个词听着抽象，其实对应的就是 Halliday 功能语法里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再现意义关心的是视觉元素怎么呈现动作和关系——动作过程里看矢量，反应过程里看目光方向，此外还有分类、分析、象征等过程。互动意义则分接触、距离、态度、情态四块，说的是角色和观众怎么通过目光建立联系，人物和观众之间是亲是疏，观众怎么感知和反应，以及图像跟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构图意义处理的是整体布局，信息值、显著性、取景都算在内，元素摆在哪里、怎么突出，都会影响主题意义的传达。这三个层面不是各管各的，它们互相配合，才构成视觉语篇的意义整体。有了这套框架，视觉符号的分析才算有了跟语言分析差不多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2 生态话语分析

2.1 豪根模式

生态话语分析是个跨学科的方法，它要处理的是语言、环境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豪根模式是它常用的一套工具，来自系统功能语言学（SFL）。这套模式关心的，是话语、社会实践和生态现实三者怎么互动。在豪根模式看来，语言的多重功能不能忽视，它在社会和文化语境里的角色也很关键。

Halliday 把语言的核心功能分成三种。表意功能管的是语言怎么构建经验和意义，也就是人怎么描述、解释、理解这个世界。表态功能管的是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态度、情感、权力关系都在这里体现。表篇功能管的则是语言的组织和结构，怎么把话说得连贯、有意义，信息才能传出去。放到生态话语分析里，研究者就是通过分析话语里的术语、比喻和描述手法，把特定的生态意识形态挖出来，看话语怎么影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看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是怎么运作的。

生态话语分析想达到什么目的？说到底，就是要把环境话语里藏着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找出来，看它们怎么塑造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态度。权力结构往往是通过语言露出来的。比如，有些话语会把环境保护问题框成某个特定利益集团才关心的事，其他观点和利益就被挤到边上去了。再比如，话语背后总有一种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它会影响公众怎么理解环境问题。研究者如果去比较，就能发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和强调经济增长、资源开发的话语之间，差别其实很大。这种对比不只是学术上的事，它还能揭示话语背后的价值取向，给环境传播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

2.2 韩礼德模式

在生态语言学领域，韩礼德模式起源于 1990 年，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在希腊举办的第九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上发表了关于语言与生态的论述。他指出语言系统本身存在生态破坏性，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名词的可数与不可数区分，如“air”“water”“oil”等被视为不可数词，潜意识地导致人们认为这些资源是无限的，进而引起过度使用和生态危机；二是语言的增长主义倾向，语言系统一般强调“增长”而忽视“减少”，使得人们追求事物的无节制发展；三是语义能动性缺失，语言往往将人类视为施事，将自然界的非人事物视为受事，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四是意识主体的区分，语言用“他 / 她”指代有意识的事物，用“它”指代无意识的事物，加深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割裂。

尽管韩礼德指出了语言系统的生态问题，他认为语法的固有特性不可改变，语言学者对此无能为力。后续的研究，如 Alexander 与 Stibbe 提出的观点，认为韩礼德模式的局限性在于侧重描述语言语法的负面影响，未能充足探讨语言使用及其话语对生态的影响。近年来，学界开始萌

生“生态话语分析”这一新理念，强调语言的具体使用对环境的影响，这一转变扩大了研究领域。生态话语分析聚焦于人类及其他有机体关系的语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环境话语分析。

2.3 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视语言为非透明交际工具，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旨在通过语言形式的分析，揭示意识形态对话语的操控，以及话语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进而促使话语对意识形态产生反作用，影响价值判断。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话语分析中的“批评”并非仅指批判、揭露或否定，而是包含一种更为广泛的“不想当然”的态度，强调揭示复杂性，挑战教条与二分法，进行自我反思，并提出不同选择。

积极话语分析应运而生，强调在批评的基础上寻找积极和建设性的方面，试图通过揭示不平等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生态语言学的形成促使生态批评话语分析逐渐发展。该领域的研究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扩展至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特别是环境问题和生态保护。

积极话语分析的提出，旨在与批评话语分析形成互补，而非替代。批评话语分析虽能揭示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及社会不平等，但其消极立场往往导致消极后果。因此，学者们开始探索以何种立场分析话语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主张将解构转化为建构，通过揭示不平等来推动社会公平。Martin（2004/2012）首次提出积极话语分析术语，认为其采取“进化”而非“革命”方式，更注重建构性，关注美好的“非现实”，通过话语分析实现和平语言学，建设更美好的社会。简而言之，积极话语分析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仅考察消极因素，还积极寻找或希望积极元素；而后者则更多站在“弱者”立场，关注社会中的消极情况。

2.4 和谐话语分析

和谐话语分析是在中国语境下提出的一种新的话语分析模式，旨在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和谐关系。它强调“和谐”的重要性，认为人与自然之间不应对立，而是应寻找一种平衡与共融的方式。该分析模式将研究的目光从负面因素转向积极因素，以探索和谐的可能性。和谐话语分析主要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支持，强调观察语言如何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态背景中构建意义。

和谐话语分析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基于中国的发展背景和哲学思想。该理论逐步成型，依托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心假设是以人为本，并提出了三项分析原则：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和制约原则。黄国文和赵蕊华（2017，2019）探讨了和谐话语分析和生态批评话语分析两者间的区别。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源于欧美国家，而和谐话语分析根植于中国语境。二者在生态问题的态度、政策制定及处理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其次，生态批评话语分析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和谐话语分析受到儒道思想影响，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最后，生态批评关注生态系统内的不公正现象，而和谐话语分析则强调不同关系的融合与共存。

和谐话语分析认同 Larson（2011）观点，将人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强调人的问题和造成的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强调“以人民为本”。和谐视角下的“人”概念需与良知、亲近和制约三原则结合考虑，以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良知原则强调人的认知、情感和意志，生态良知引导人的生态行为。亲近原则区分人与其他生态参与者的亲近关系，影响人的行为选择。制约原则通过规范化行为、制度化引导，确保人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这三项原则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和谐话语分析的基础框架，旨在解决中国特定背景下的生态问题，结合传统思想与现代发展，不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还能扩展至国际领域。这一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生态语言学领域的理论自觉，也为跨文化生态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 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多模态理论与生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多模态理论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根基，通过视觉语法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三个维度，为解读多种符号资源的协同表意提供了分析框架。生态话语分析则从豪根模式、韩礼德模式出发，经由批评话语分析与积极话语分析的互补，最终在中国语境下发展出和谐话语分析这一新范式。将多模态理论与生态话语分析相结合，对于揭示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 冯亚冰. 汉英“禁烟”广告多模态隐喻的对比研究[D]. 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7.

[2]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 外语学刊，2007(5): 82-86.

[3] 胡壮麟.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1): 1-10.

[4] 李战子. 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J]. 外语研究，2003(5): 1-8.

[5] 顾曰国. 多媒体、多模态学习剖析[J]. 外语电化教学，2007(2): 3-12.

作者简介：霍晶（1984-），女，汉族，哈尔滨齐齐哈尔市，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从事英语教学和理论语言学研究工作。